

· 女性与社会发展研究 ·

从立业到成家： 社会转型背景下教育与工作对初婚时间的影响

曹桂祥, 李建新

(北京大学 社会学系, 北京 100871)

[摘要] 从先成家后立业到先立业后成家的转变是我国青年向成年转型过程中的重要趋势, 这种转变敦促我们重新审视初婚时间变化趋势及其影响因素。已有关于教育和工作如何影响初婚时间的研究大多聚焦于初婚时间的早晚效应, 这种解释遮蔽了其影响初婚时间的快慢效应。基于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 2018 年数据, 使用离散型事件史分析方法, 将风险期起点从 15 岁生理性成熟变为获得初职时间, 考察教育和工作类型对于初婚时间快慢的影响发现, 教育和工作类型会对个体初婚时间的快慢产生影响。总体而言, 受教育水平越高, 人们进入初婚越快; 相比于个体工作, 体制内工作者进入初婚越快。这种作用在不同性别、初婚队列之间存在明显差异。这为我们理解当前青年人的婚姻问题提供了参考。

[关键词] 社会转型; 立业成家; 初婚快慢; 教育与工作类型

[中图分类号] C913.68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6838(2024)05-0032-18

一、问题提出

婚姻不仅是个体重要的生命事件, 更是社会变迁的时代缩影^①。对于个体而言, 缔结婚姻关系关乎个人幸福, 更关乎代际传承、宗族希望。对于社会而言, 婚姻对社会构成、人口再生产和未来人口结构产生巨大影响^②。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 婚姻模式逐渐转型, 加之当前的低生育率和人口结构老化等人口新国情, 使得研究其变化趋势并寻求其社会经济根源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初婚时间是婚姻模式的重要内容, 初婚时间计算会随社会转型而发生改变。已有研究证明初婚时间不断推迟, 这类研究主要基于生理性基础讨论初婚时间问题, 大多以 15 岁具有生育能力为起点, 认为随着时代的变化, 初次进入婚姻的时间越来越晚。但对于个体而言, 他会从什么时候开始考虑结婚呢? 中国一直有一个词语叫成家立业, 讲的是中国人在生命历程的成年转型期要先成

[基金项目]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中国人口长期均衡发展关键问题研究”(项目编号: 22JJD840001)

[作者简介] 曹桂祥, 男,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博士研究生, 主要从事人口社会学研究; 李建新, 男,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北京大学中国社会与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 主要从事人口学、人口社会学研究。

① 於嘉, 谢宇:《社会变迁与初婚影响因素的变化》,《社会学研究》,2013 年第 4 期; YU J., XIE Y., Changes in the Determinants of Marriage Entry in Post-Reform Urban China, *Demography*, Vol.52, No.6, 2015, pp.1869-1892.

② 林晓珊:《改革开放四十年来的中国家庭变迁: 轨迹、逻辑与趋势》,《妇女研究论丛》,2018 年第 5 期; 李月, 张许颖:《婚姻推迟、婚内生育率对中国生育水平的影响——基于对总和生育率分解的研究》,《人口学刊》,2021 年第 4 期。

家后立业。这种顺序一方面可能和我国一直以来的小农经济生产方式有关,另一方面和儒家文化中的集体主义取向思维方式有关^①,在这种条件下个体在15岁生理性成熟后会优先考虑成家。但是伴随着我国现代化、市场化的推进以及西方文化的冲击,中国人的个体意识开始觉醒,他们在成年转型期逐渐将建构个人身份前置于组成家庭。西方语境下将这种转型下的空档期称为初显成人期(Emerging Adulthood)^②,意指青年群体生理性成年和社会性成年的脱节,因为这种脱节造成了初婚的延迟^③。之所以会存在空档期和脱节,是因为在原有生命历程中嵌入了教育、就业等环节,而且这些环节正在制度化成为生命历程的一部分^④,使得成年转型不再是成家立业,而是逐渐转向立业成家。从成年转型的变迁来看,计算初婚的起点也发生了相对变动,可以不再是生理性成熟的15岁,而是在完成制度化生命历程中的特定事项后才开始考虑。这正如现有研究提到的,不立业难成家^⑤。立业成了成家的起点,这为我们思考初婚时间问题提供了新的视角。

社会经济资源是影响初婚时间的关键因素,其影响路径会随社会转型而不断拓展。由于婚姻具有规范性期望,而且伴随着长期承诺,因此社会经济资源特别是具有长期性的社会经济地位作为履行承诺的关键因素^⑥,对于婚姻建立与维持具有重要作用^⑦。教育和工作作为社会经济资源的两个重要参照,受到学者们的广泛关注。对于成家和立业,大量研究已经证明先接受教育和找工作在一定程度上推迟了人们进入初婚的时间,特别是对女性而言更是如此^⑧。但这个结论所隐含的是结婚和教育、工作之间是竞争性关系,即如果选择先上学、工作,就必然放弃了早结婚^⑨。但如果接受教育、寻找工作已经成为生命历程中必须要完成的事,特别是伴随着教育普及、性别平等化、市场环境波动以及消费主义文化兴起,教育、工作和婚姻逐渐从竞争性关系变成了具有时序关系的生命事件,即通过教育积累人力资本,审慎选择合适的工作,然后再进入婚姻。在这种先立业后成家的条件下,教育和工作如何影响人们进入初婚呢?本文尝试从我国社会转型所带来的生命历程变迁出发,将取得初职时间作为初婚风险期起点,具体考察在教育和就业逐渐成为制度化生命历程一部分的情况下,教育和工作如何影响人们进入初婚。这种影响既包括既有研究已经论证的教育和工作对初婚早晚的影响,也包括对于进入初婚快慢的影响,本文着重关注后者。特别需要指出的是,虽然教育和工作都是社会经济资源的重要指标,但二者具有不同的内涵。接受教育作为人力资本积累的重要方式,主要反映的是个体的经济潜力。尽管受教育水平也可以影响工作的获得,但不同类型工作的选择反映的是个体基于未来生活规划的不同考量。

①李蔓莉:《“初显成人期”:阶段特征与累积效应》,《中国青年研究》,2018年第11期。

②ARNETT J. J., *Emerging Adulthood: A Theory of Development from the Late Teens Through the Twenties*, *American Psychologist*, Vol.55, No.5, 2000, pp.469-480.

③段鑫星,程嘉:《成人初显期理论及其评述》,《当代青年研究》,2007年第2期;王樱洁,潘彦霖:《婚姻成本:中国青年初显成人期的出现之因》,《中国青年研究》,2018年第11期。

④郑作或,胡珊:《生命历程的制度化:欧陆生命历程研究的范式与方法》,《社会学研究》,2018年第2期。

⑤潘修明,张春泥:《不“立业”,难“成家”——青年—成年转变中的就业状态与婚育行为》,《中国青年研究》,2023年第8期。

⑥XIE Y., RAYMO J. M., GOYETTE K., et al., *Economic Potential and Entry into Marriage and Cohabitation*, *Demography*, Vol.40, No.2, 2003, pp.351-367.

⑦贺光桦,葛霆,于皓:《趋同还是趋异:教育对两性初婚时间的影响及其地区差异》,《社会发展研究》,2023年第3期。

⑧刘昊:《高校扩招对我国初婚年龄的影响——基于普查数据的分析》,《人口与经济》,2016年第1期;贺光桦,张瑶,吴晓刚:《教育程度越高,结婚就越晚吗?婚姻市场上本地户口的调节作用》,《社会》,2021年第2期。

⑨杨振宇,张程:《教育深化对初婚年龄、生育数量的影响——基于义务教育法实施的准试验研究》,《人口与发展》,2018年第1期。

因此本文的研究问题是:教育和工作类型对于进入初职个体的初婚时间快慢影响如何?这种影响是否在性别之间存在差异?这种影响在不同初婚队列之间是否存在差异?

二、文献回顾与研究假设

(一) 婚配机制变迁引发的初婚时间快慢问题

如何获得满意的婚姻是人们在进入婚姻时的重要考量内容,这一考量会影响人们进入初婚的时间。已有研究发现,满意婚姻主要通过婚前选择和婚后适应两种方式获得^①。婚前选择是指在结婚之前选择合适的配偶从而保证后续的婚姻生活。婚后适应是指通过结婚后双方的磨合与互相理解实现满意婚姻。对于先成家后立业的模式而言,尽管结婚双方的父母会通过一定程度的婚前选择方式来保证婚姻的匹配度,比如传统的门当户对,而且传统家庭观念下父代家庭会为子代结婚提供确定性支持,但对于结婚子代而言主要是通过婚后适应方式提高婚姻满意度。然而,伴随着社会转型和先立业后成家模式的出现,虽然父代家庭依然为子代结婚提供重要支持,但个体意识的觉醒使得子代更加重视婚前选择在结婚中的作用。如何进行婚前选择,既有主观因素影响也受客观因素制约。对于个体而言,主观因素如外貌、感情、人品、性格等因素,已被研究证明会对个体配偶选择产生影响^②;客观因素特别是配偶的社会经济地位,对于个体经营婚后生活具有重要影响,成为婚前选择的重要参考^③。伴随着社会的发展,客观因素也逐渐取代主观因素而对婚前选择产生更重要影响^④。

婚前选择会影响人进入婚姻的早晚,但也会影响人进入婚姻的快慢。Oppenheimer^⑤在提出婚姻寻找理论(Marriage-search)时指出,工业化社会以来,社会经济特征具有更大程度的不可观测性,特别是在适龄结婚阶段,个体往往处于发展的早期阶段,社会经济特征还未完全确定。因此他认为,尽管社会经济因素对于婚前选择具有重要意义,但因为社会经济特征的不确定性,个体需要更多时间来确定社会经济特征,所以会推迟进入婚姻^⑥。但推迟进入婚姻并不等于放弃对于婚姻的渴望,相反,较好的社会经济特征可能会促进人们进入婚姻^⑦。因此仍需进一步延伸思考的是,人们会因为想要尽可能获得稳定的社会经济特征而等待和推迟婚姻,但在获得了确定性特征之后,社会经济特征又如何影响个体进入婚姻呢?换言之,如果以获得确定性社会经济特征作为起点,那么这些社会经济特征将如何影响个体进入婚姻的快慢呢?

① OPPENHEIMER V. K., A Theory of Marriage Timing,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Vol.94, No.3, 1988, pp.563-591.

② 孙秀艳:《青年择偶标准的历史演变和现实思考》,《社会》,2002年第4期;王磊,李鲁:《国企改革与工业发展:改革开放40年的经验与证据》,《经济体制改革》,2019年第2期;陆峥,刘梦琴:《青年择偶观现状研究》,《当代青年研究》,2016年第5期。

③ 徐安琪:《择偶标准:五十年变迁及其原因分析》,《社会学研究》,2000年第6期;李煜,徐安琪:《择偶模式和性别偏好研究——西方理论和本土经验资料的解释》,《青年研究》,2004年第10期。

④ 齐亚强,牛建林:《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婚姻匹配模式的变迁》,《社会学研究》,2012年第1期。

⑤ OPPENHEIMER V. K., A Theory of Marriage Timing,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Vol.94, No.3, 1988, pp.563-591.

⑥ KALMIJN M., The Influence of Men's Income and Employment on Marriage and Cohabitation: Testing Oppenheimer's Theory in Europe, *European Journal of Population*, Vol.27, No.3, 2011, pp.269-293.

⑦ OPPENHEIMER V. K., Women's Rising Employment and the Future of the Family in Industrial Societies,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Review*, Vol. 20, No. 2, 1994, pp.293-342.

(二) 教育和工作如何影响人进入婚姻的快慢

教育如何影响结婚,已有研究大致得出两种结论。第一种是教育推迟结婚,这一方面是因为受教育水平越高的个体需要在学业上花费的时间更长,且上学期间不利于结婚,因此会推迟婚姻;另一方面是因为受到同质婚的影响,受教育水平越高,群体规模越小,越不利于找到匹配的结婚对象,即婚姻市场不匹配假说^①,所以推迟婚姻。第二种是教育加速结婚,这主要体现为教育水平的提升意味着人力资本的增加,较高水平的人力资本具有较高的经济实力^②,特别是在当前结婚成本不断提高^③、房价不断上升的社会^④,教育会促进婚姻。工作类型如何影响结婚,Oppenheimer^⑤认为年轻人在工作初期工作不稳定、收入不高,需要等待一段时间才能进入工作的成熟期,特别是好的工作需要前期的工作培训和积累,因此会较晚进入婚姻。但另一方面,也有研究发现稳定的工作、职业地位高的工作可以加速人们进入婚姻^⑥。在中国语境下,“体制内”工作具有较高的社会声望和较好的社会福利,工作更加稳定轻松,而且在中国社会持续发挥作用^⑦。改革开放以来,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促进了民营经济的壮大,为个体提供了丰富的工作岗位和竞争性的薪酬待遇,特别是在高水平劳动力群体中,与体制外工作没有显著差异^⑧。本文的重点在于人们获得教育和工作后,二者对于婚姻的影响,因此本文提出第一组假设:

假设 1a:受教育水平越高,进入初婚越快。

假设 1b:相对于个体工作,体制内工作和民营工作进入初婚越快。

(三) 教育和工作类型影响进入婚姻快慢的性别差异

Becker^⑨在帕森斯性别角色分工理论的基础上提出经济独立性假设,用于解释夫妻双方如何通过角色分工实现家庭效益最大化。该假设首先指出,只有当组成家庭的效益超过个体生活的效益,个体才会选择进入婚姻。进而以性别角色专门化的预设为出发点,认为婚姻的价值在于以性别分工为基础的夫妻间的相互依赖,从而实现家庭效益最大化。特别是在中国社会,仍有部分人受到传统父权制思想的影响,认为“男主外、女主内”的家庭分工更有效率,男性更多承担为家庭提供经济资源的责任,女性更多承担照顾家庭的责任^⑩,这样的婚姻也更稳定。因此教育和工作对初婚快慢的影响具有性别

①DONG H., XIE Y., Trends in Educational Assortative Marriage in China over the Past Century, *Demography*, Vol.60, No.1, 2023, pp.123-145; RAYMO J. M., IWASAWA M., Marriage Market Mismatches in Japan: An Alternative View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Women's Education and Marriage,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Vol.70, No.5, 2005, pp.801-822.

②吴要武,刘倩:《高校扩招对婚姻市场的影响:剩女?剩男?》,《经济学(季刊)》,2015年第1期。

③王樱洁,潘彦霖:《婚姻成本:中国青年初显成人期的出现之因》,《中国青年研究》,2018年第11期。

④刘润秋,唐宇娣,马一玲:《高房价让青年不愿结婚了吗》,《财经科学》,2023年第10期。

⑤OPPENHEIMER V. K., A Theory of Marriage Timing,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Vol.94, No.3, 1988, pp.563-591; OPPENHEIMER V. K., KALMIJN M., LIM N., Men's Career Development and Marriage Timing During a Period of Rising Inequality, *Demography*, Vol.34, No.3, 1997, pp.311-330.

⑥王鹏,吴愈晓:《初婚年龄的影响因素分析——基于CGSS2006的研究》,《社会》,2013年第3期。

⑦XIE Y., WU X., Danwei Profitability and Earnings Inequality in Urban China, *The China Quarterly*, Vol.195, 2008, pp.558-581; 孙文凯,张政:《工作单位性质对女性生育意愿的影响》,《人口学刊》,2023年第2期。

⑧BIAN Y., LOGAN J. R., Market Transition and the Persistence of Power: The Changing Stratification System in Urban China,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Vol.61, No.5, 1996, pp.739-758; 尹志超,甘犁:《公共部门和非公共部门工资差异的实证研究》,《经济研究》,2009年第4期。

⑨BECKER G. S., A Theory of Marriage: Part I,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Vol.81, No.4, 1973, pp.813-846; BECKER G. S., A Theory of Marriage: Part II,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Vol.82, No.2, 1974, pp.S11-S26.

⑩BLOSSFELD H. P., HUININK J., Human Capital Investments or Norms of Role Transition? How Women's Schooling and Career Affect the Process of Family Formation,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Vol.97, No.1, 1991, pp.143-168.

差异。对于男性而言,较强的经济实力能够更快地进行婚姻准备,同时能更好地承担家庭的经济责任,所以更容易受到女性的青睐,能够促进其进入婚姻^①;但对于女性而言,受教育水平高不利于其进入婚姻,因为接受教育的女性经济更加独立,婚姻对其吸引力更低^②。但也有研究表明,在部分发达国家,随着女性接受高等教育和参与劳动力市场的情况愈加普遍,生活成本不断提高,高学历的女性在婚姻市场上逐渐受到青睐^③,因为她们的经济支持能够更好地满足家庭的经济需要。但对于女性而言,更容易面临工作—家庭冲突,这就使得性别差异较小和劳动保障规范的体制内工作对女性更加友好,而劳动时间去制度化、绩效竞争压力大的民营工作不利于女性进入婚姻^④。因此,本文提出第二组假设:

假设 2a:对于男性来说,受教育水平越高,进入婚姻越快。

假设 2b:对于男性来说,相对于个体工作,体制内工作和民营工作进入婚姻更快。

假设 2c:对于女性来说,受教育水平越高,进入婚姻越慢。

假设 2d:对于女性来说,相对个体工作,民营工作进入婚姻更慢,体制内工作进入婚姻更快。

(四) 教育和工作影响进入婚姻快慢的队列差异

个体结婚选择与时代命运紧密相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经历了巨大的社会转型和变迁,个体在不同时期进入初婚会对其婚姻选择产生重大影响。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我国为了实现快速工业化,实行严格的户籍管理制度和计划经济体制,并于 1958 年在农村将人口通过人民公社制度固定在农业部门从事农业生产,在城市将人口按照计划统一分配到企事业单位,工作类型的差异主要源于城乡二元分割的社会福利保障制度的差异^⑤。在这一时期,我国人口的受教育水平以文盲为主,结合我国这一时期的政治经济特征,教育主要服务于社会主义建设,教育的分层作用较弱,接受较高水平教育的人数较少。因此,在这一阶段,有体制内工作和较高学历者会更快进入婚姻^⑥。1978 年我国进行改革开放,经济体制开始从严格的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从一元的公有制向公有制为主体的混合所有制转变^⑦。在农村地区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并逐渐开放农村市场发展多种经营,个体经济状况逐渐改善^⑧。此阶段乡镇企业开始出现,国企放权让利、民营企业开始破土^⑨;教育领域拨乱反正,高考恢复,教育开始发挥分层作用,但这一阶段仍以普及义务教育和扫盲为主。在这一阶段,个体经济和民营经济都有了发展机会,不同工作类型对进入初婚快慢的影响差异有所减弱。恢复高考的政策使得高等教育开始发挥作用,但受规模限制,学历对进入初婚

①SCHWARTZ C. R., MARE R. D., Trends in Educational Assortative Marriage from 1940 to 2003, *Demography*, Vol. 42, No.4, 2005, pp.621-646; KUO J. C., RALEY R. K., Is It All About Money? Work Characteristics and Women's and Men's Marriage Formation in Early Adulthood, *Journal of Family Issues*, Vol.37, No.8, 2016, pp.1046-1073.

②LAVY V., ZABLITSKY A., Women's Schooling and Fertility under Low Female Labor Force Participation: Evidence from Mobility Restrictions in Israel,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Vol.124, 2015, pp.105-121.

③SWEENEY M. M., Two Decades of Family Change: The Shifting Economic Foundations of Marriage,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Vol.67, No.1, 2002, pp.132-147.

④王美艳:《中国城市劳动力市场上的性别工资差异》,《经济研究》,2005年第12期;吴愈晓,王鹏,黄超:《家庭庇护、体制庇护与工作家庭冲突——中国城镇女性的就业状态与主观幸福感》,《社会学研究》,2015年第6期。

⑤冬连:《中国二元社会结构形成的历史考察》,《中共党史研究》,2005年第1期;韩俊:《中国城乡关系演变60年:回顾与展望》,《改革》,2009年第11期。

⑥此处需要注意,从成家立业到立业成家的转变是随着时代发展逐渐发生的,早期成家立业会更普遍,但仍存在先立业后成家的情况。本文主要考察的是先立业后成家的个体。

⑦何瑛,杨琳:《改革开放以来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历程、成效与展望》,《管理世界》,2021年第7期。

⑧吴丰华,韩文龙:《改革开放四十年的城乡关系:历史脉络、阶段特征和未来展望》,《学术月刊》,2018年第4期。

⑨项安波:《重启新一轮实质性、有力度的国企改革——纪念国企改革40年》,《管理世界》,2018年第10期。

快慢的差异影响相对较小。1993年,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宣布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从而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在此期间,国企改革进一步深化,国家为提高市场竞争力,开始抓大放小、减员增效,并于1998年进一步提出国企改革的三年计划^①,逐渐打破了人们对铁饭碗的想象。与此同时,对民营经济的限制进一步放松,市场准入门槛进一步降低,有力地刺激了民营企业的发展^②。这一阶段,我国高等教育开始从精英教育走向大众教育,高等教育入学率开始快速提升。伴随着我国经济进入快速增长阶段,高等教育的回报率也在不断提高。因此,对于进入初婚快慢的影响而言,工作类型和教育之间的差异开始扩大,市场经济使得在民营单位工作和接受高等教育者进入初婚更快。2008年,首先爆发于美国的金融危机迅速席卷全球,世界经济受到巨大冲击,也对我国经济产生了连锁反应。尽管我国出台政策缓冲经济危机的影响,但以劳动密集型产业和出口导向型产业为主要特征的经济形态因为世界经济低迷而陷入严峻的就业危机^③,特别是市场部门受到冲击后保持谨慎收缩状态,而体制内工作不论是无须考虑经济理性抑或出于维持社会稳定的目的,在就业上保持常态甚至扩张^④。我国经济也因此开始逐渐从高速增长转向中低速增长,逐渐从劳动密集型的低附加值经济向资本和技术密集型的高附加值经济转型,对高水平人才的需求进一步增加。这一阶段受人们避险心态的影响,体制单位在婚姻市场的影响力再次提升,接受高等教育者依然具有优势。基于上述梳理,本文提出第三组假设:

假设 3a:不同初婚队列,教育对初婚快慢的影响存在差异,不同受教育程度的影响先缩小再扩大。具体表现为相对于1978年之前初婚队列中教育的差异主要体现为高中学历和初中及以下学历的差异,1978—1998年初婚队列中高等教育开始发挥影响,不同学历间作用差异有所缩小。伴随着高等教育愈加普及,不同教育层次对于晚近初婚队列影响的差异不断扩大。

假设 3b:不同初婚队列,工作类型对初婚快慢的影响存在差异。不同工作类型的影响先缩小再扩大。具体表现为相对于1978年之前初婚队列主要表现为个体和体制内工作的差异,1978—1998年,改革开放增大了个体工作和民营单位工作的影响,不同工作类型对于初婚快慢的影响差异有所缩小。1998—2008年,市场化进一步推进,国企改革进一步深化,体制内工作的影响有所减弱,民营单位工作的影响不断增大,不同类型单位对于初婚快慢的影响进一步分化。2008年之后,经历经济危机,体制内工作受到青睐,体制内工作和民营工作之间的差异缩小,但相对个体工作而言,对初婚快慢的影响进一步扩大。

三、数据、测量和方法

(一)数据来源

本文使用的微观数据来自中山大学组织的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China Labor-force Dynamics

^①石建国:《1998—2000年国企改革的回顾》,《百年潮》,2017年第1期;王磊,李鲁:《国企改革与工业发展:改革开放40年的经验与证据》,《经济体制改革》,2019年第2期。

^②任保平,李培伟:《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到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政治经济学评论》,2024年第2期。

^③丁守海:《中国就业弹性究竟有多大?——兼论金融危机对就业的滞后冲击》,《管理世界》,2009年第5期;陈彦斌,姚一旻:《中国经济增速放缓的原因、挑战与对策》,《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2年第5期。

^④苗国:《生育率下降背景下高等教育扩张与大学生就业困难——从“98亚洲金融危机”到2008“次贷金融危机”》,《人口与发展》,2010年第4期。

Survey,简称 CLDS)2018 年数据。CLDS 项目以 15~64 岁的劳动年龄人口为调查对象,采用多阶段、多层次与劳动力规模成比例的概率抽样方法,对我国 29 个省区市(不包括港澳台、西藏和海南)城乡社区家庭户的全部劳动力进行两年一次的追踪调查。2018 年共有数据样本 16537 个,根据本文研究需要,仅保留有工作经历且第一份工作时间早于初婚时间的样本。同时本文对核心因变量、自变量缺失的样本进行删除,对部分控制变量缺失值进行插补,最终保留样本 7924 个^①。本文也对初职时间和最高受教育程度完成时间进行查看,发现约 10%样本的最高学历完成时间要晚于初职时间,删除该部分样本后,结果差异不大,故在分析中未对这部分样本进行删减。这意味着在本研究中,样本的受教育程度不以受教育年限长短的方式影响初婚时间。

(二) 变量测量

1. 因变量。本文的因变量为在某一年份是否结婚。具体编码方法为,根据本文的研究问题,将风险集定义为从第一次工作到第一次结婚的个体。如果个体结婚则退出风险集。笔者根据风险期构建“人一年”格式数据,即在风险期内,变量数值均为 0;当个体退出风险集,则编码为 1。如果个体从进入第一次工作到 55 岁一直未进入婚姻,则是否结婚这一变量在风险期内一直为 0。这是事件史分析中针对右删失数据的处理。

2. 自变量。本文的核心自变量为个体的受教育程度和初职类型。个体受教育水平根据“您的最高学历”和“您的最高学历是否毕业”两项进行编码。本文将最高学历分为三类,分别是“初中及以下”,包括初中、小学/私塾和未上过学;“高中”,包括普通高中、职业高中、技校和中专;“大专及以上”,包括大专、本科、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然后根据“您的最高学历是否毕业”这一问题,保持“已毕业”和“肄业”的最高学历状态,删除“仍在读”样本。个体的初职类型,根据“您第一份工作”这一问题的选项,首先划分有单位和无单位,有单位根据性质划分为“体制”,包括党政机关、人民团体、军队,以及国有/集体事业单位、国有企业、集体企业、村/居委会等自治组织;“民营”,包括民营、私营企业,外资、合资企业,民办非企业、社团等社会组织,以及个体工商户;无单位划为“个体”,包括务农、自由职业者和无固定工作者。

3. 控制变量。控制变量的选取主要考虑前人研究和可能对本研究因变量产生影响的变量。14 岁时其父母的最高受教育水平,这一方面是考虑到父母的受教育水平是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的表征,能够影响个体的初职和初婚,另一方面是考虑到父母的受教育水平可能会有变动的可能性,故选取相对更前期的受教育水平。选取 14 岁时居住地主要考虑早期社会文化环境可能对个体选择工作、进入婚姻可产生的影响。个体的党员身份在不同时期具有不同的社会意义,会对其找工作和婚姻产生影响。控制工作经历主要考虑到部分样本存在初职不同于初婚前职业的情况。控制初婚队列,主要是考虑到不同时间点进入初婚的群体存在差异。在队列划分上,本研究选择 1978 年、1998 年和 2008 年三个时间节点。节点的选择主要考虑到国家体制改革和市场化进程。1978 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开启改革开放,将国家重心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1998 年是国家推进国企改革的关键节点,也是深化 1992 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举措,大批国企员工下岗,打破了人们对于体制稳定的想象。2008 年爆发国际金融危机,导致全球范围内的经济衰退,市场主体受到巨大冲击。控制时变变量风险期,该变量由初婚年龄—初职年龄生成并转换为离散型事件史数据格式。

^①在数据清理阶段,首先删除样本 5248 个,其中约 70%的样本源于无初婚时间和无工作两个变量,其余为存在缺失值和数据逻辑问题的样本;其次删除初婚时间早于初职时间样本 3365 个,剩余样本 7924 个。

表 1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比例(%) / 均值			P 值
	总体	男性	女性	
初婚(是=1)	87.81	85.58	90.26	0.000
初婚年龄	24.05	25.01	23.04	0.000
受教育程度				
初中及以下	66.08	65.10	67.15	
高中	17.03	19.11	14.75	0.000
大专及以上	16.89	15.79	18.09	
初职工作类型				
个体	50.71	51.96	49.32	
体制	20.66	20.94	20.35	0.000
民营	28.63	27.10	30.33	
初职年龄	19.08	19.31	18.83	0.000
父母受教育程度				
小学及以下	67.30	69.68	64.69	
初中	18.73	17.83	19.71	0.000
高中及以上	13.97	12.49	15.60	
工作经历	1.12	1.20	1.04	0.000
党员(是=1)	4.96	6.23	3.56	0.000
地区				
西部	32.73	32.64	32.85	
东北	6.02	5.42	6.69	0.000
中部	20.31	20.91	19.63	
东部	40.94	41.03	40.83	
初婚队列				
1978 年之前	8.05	7.73	8.41	
1978—1998 年	50.69	50.28	51.15	0.003
1998—2008 年	14.61	14.13	15.15	
2008 年之后	26.64	27.87	25.29	
样本量	7924	4155	3769	

(三) 分析方法及思路

本文选取离散型事件史分析方法研究初婚时间快慢问题,一方面是因为事件史分析方法是对风险期长度和风险率的研究,可以很好地反映本文所关注的进入初婚时间的快慢问题。本文的核心概念初婚时间快慢也是通过初婚风险率进行表达,风险率越高,意味着进入初婚越快,反之则相反。另一方面是根据变量特征和模型统计特性,数据测量的时间尺度以年为单位,模型不受比例风险函数限制,更方便加入时变和非时变变量。因为本文研究的因变量为在某一年份是否结婚,故使

用 logit 作为连接函数。

具体分析思路是:首先对变量的基本情况以及不同受教育程度、不同工作类型的风险期的分布及其在性别上的差异进行描述性分析;其次构建“人一年”数据,讨论受教育程度和工作类型对初婚风险的影响;再次是探讨受教育程度和工作类型对初婚风险的影响在不同性别之间的差异;最后讨论不同初婚队列下,受教育程度和工作类型对初婚风险的影响。

四、基本结果

(一) 描述性分析结果

表 2 呈现了男女两性在不同受教育程度、工作类型和初婚队列上的初职和初婚年龄分布以及时间间隔。在受教育程度上,可以发现,不论男性还是女性,其初职年龄和初婚年龄都随着受教育程度的提高而提高,但初职—初婚的时间间隔随着受教育程度的提高而缩短。这表明受教育程度会推迟人们进入工作和婚姻的时间,但也可能会加速人们从工作进入婚姻。在工作类型上,从个体到体制内再到民营企业工作,男性和女性的初职和初婚年龄都在依次提高,这表明体制内和民营企业工作类型会推迟个体进入婚姻,这可能是由于相对于个体工作,体制内和民营企业工作具有一定的教育门槛,这种门槛推迟了个体进入婚姻的时间。但从时间间隔上,从个体到体制内再到民营企业工作是依次降低,这说明体制内和民营企业工作类型会加速个体进入婚姻。从结婚队列来看,随着队列的时间临近,初职和初婚年龄都不断提高,但时间间隔经历了先增加再回落的过程,对于这种回落一种可能的解释是经济形势不佳可能会降低人们对于择偶标准和婚姻质量的要求,从而更快进入婚姻^①,但从总体来看,时间间隔总体呈现上升趋势,这说明人们进入婚姻的速度总体上变慢了。而且,不论受教育程度、工作类型还是结婚队列,女性的初职和初婚年龄都要小于男性,时间间隔也比男性短,表明女性会比男性更早、更快进入婚姻。

表 2 分受教育程度、工作类型和结婚队列的初职—初婚年龄分布情况

受教育程度	男			女				
	初中及以下	高中	大专及以上	初中及以下	高中	大专及以上		
初职年龄	17.86	20.24	22.20	17.50	20.05	21.88		
初婚年龄	24.46	25.34	27.27	22.30	24.23	25.56		
间隔	6.60	5.10	5.07	4.80	4.18	3.68		
工作类型	个体	体制	民营	个体	体制	民营		
初职年龄	17.67	20.04	20.85	17.36	19.32	20.38		
初婚年龄	24.22	25.65	26.37	21.89	24.04	24.76		
间隔	6.55	5.61	5.52	4.53	4.72	4.38		
初婚队列	1978 前	1978—1998	1999—2008	2008 后	1978 前	1978—1998	1999—2008	2008 后
初职年龄	17.39	18.37	19.56	21.08	16.14	18.05	19.53	20.16
初婚年龄	22.27	24.48	26.27	27.25	20.23	22.67	24.18	24.63
间隔	4.88	6.11	6.71	6.17	4.09	4.62	4.65	4.47

^①陆华东:《经济危机时期的婚姻变动特征——以对 20 世纪 30 年代上海市民的结婚率、离婚率的分析为例》,《电子科技大学学报(社科版)》,2011 年第 6 期。

(二) 离散事件史分析结果

1. 受教育程度和工作类型对初婚风险的影响。模型 1 考察了受教育程度对初婚风险的影响。可以看到,相比于初中及以下的样本,高中及以上学历者均能显著提高初婚风险,意味着高受教育水平的人结婚更快^①,验证了假设 1a。其中,高中学历者比大专及以上学历者提高的风险更高,高中学历者提高了 22%,大专及以上学历者提高了 18%。这可能是受到初婚队列的影响,即早期队列占比较高,加之大专及以上学历占比相对较低,故高中学历者在初婚风险上发挥作用更大。女性比男性更快进入婚姻,相对男性提高了 49.8%的初婚风险。工作经历增加显著降低初婚风险,说明工作变动会影响人们的结婚计划。在地区上,相对于西部,东北和东部的初婚风险显著降低,其中东北降低了 20%左右,东部降低了 5.5%。模型 2 考察的是工作类型对初婚风险的影响。相对于参照组从事个体工作,参加体制内工作能够显著提高 16.9%的初婚风险,说明相比于个体工作,从事体制内工作的人能更快进入婚姻。从事民营企业工作会下降 4.3%,但不显著,说明参加民营企业工作的人在进入婚姻风险和个体工作没有区别。部分验证了假设 1b,这说明不同工作类型对初婚时间的差异性影响,同时也说明相对于个体和民营企业工作,体制内工作的相对优势^②。其他变量上,和受教育程度的模型没有显著差异。在模型 3 的交互模型^③中,主效应和模型 1 及模型 2 系数区别不大,除大专及以上学历一项变为不显著,各项系数反而有所提高。交互项上,除高中 * 体制和高中 * 民营交互项显著外,其他不显著。经过计算,高中学历且在体制内工作者相对于初中及以下学历从事个体工作的初婚风险要高 21.9%,高中学历在民营企业工作相对于初中及以下学历者从事个体工作初婚风险要高出 7.3%,表明不同受教育程度对于初婚风险的影响确实会受到工作类型的调节,特别是具有高中学历的样本,不同工作类型的选择会显著影响其初婚风险,而大专及以上学历者则没有受到工作类型的影响,说明受教育水平越高,教育和工作类型对初婚风险的影响方式越具有独立性。由于交互项基本结论与非交互模型差异不大,因此在后续分析中,主要关注主效应结果。具体见表 3。

表 3 初婚风险的离散事件史分析(N=47252)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受教育程度(初中及以下为参照组)			
高中	1.220*** (0.046)		1.593*** (0.108)
大专及以上	1.180*** (0.054)		1.267 (0.238)
工作类型(个体为参照组)			
体制		1.169*** (0.045)	1.174*** (0.069)
民营		0.963 (0.037)	0.982 (0.044)

^①OPPENHEIMER V. K., Women's Rising Employment and the Future of the Family in Industrial Societies,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Review*, Vol. 20, No. 2, 1994, pp.293-342.

^②张海东,袁博:《双重二元劳动力市场与城市居民的阶层认同——来自中国特大城市的证据》,《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1期。

^③交互项模型的设置主要想考察教育是否通过工作类型发挥作用。尽管当前工作类型的选择越来越受到教育门槛的限制,但考虑到样本所包含的队列多样性,选择保留交互项模型。

续表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交互项			
高中 * 体制			0.652*** (0.066)
高中 * 民营			0.686*** (0.064)
大专 * 体制			0.875 (0.176)
大专 * 民营			0.842 (0.167)
党员(是=1)	1.013 (0.067)	1.004 (0.066)	0.964 (0.065)
性别(女=1)	1.510*** (0.040)	1.498*** (0.040)	1.520*** (0.041)
父母受教育程度(小学及以下为参照组)			
初中	0.964 (0.035)	1.018 (0.038)	0.999 (0.038)
高中及以上	0.918* (0.042)	0.982 (0.043)	0.942 (0.043)
工作经历		0.978** (0.009)	0.976*** (0.009)
地区(西部为参照组)			
东北	0.817*** (0.048)	0.802*** (0.047)	0.799*** (0.047)
中部	1.026 (0.038)	1.037 (0.038)	1.03 (0.038)
东部	0.915*** (0.029)	0.945* (0.030)	0.930** (0.030)
风险期对数	0.963** (0.014)	0.955*** (0.014)	0.963** (0.014)
常数项	0.101*** (0.005)	0.106*** (0.006)	0.100*** (0.005)

注:括号内为标准误;* p<0.1,** p<0.05,*** p<0.01。

2.分性别考察工作类型和受教育程度对初婚风险的影响。模型 4 和模型 5 为男性样本条件下教育和工作类型对初婚风险的影响,结果与前述模型结果基本一致,但系数有所提升。具体而言,相对于初中教育,男性受高中教育和大专及以上学历教育的初婚风险,分别高出 39.6%和 36.9%。这表明受教育水平越高,男性进入婚姻越快,假设 2a 得到验证。相对于个体工作,体制内工作的人初婚风险显著高出 39.9%,这表明相对于个体工作,体制内工作人员进入婚姻更快。相比较而言,在民营企业工作的人初婚风险高出 8.4%,但不显著。假设 2b 得到部分验证。相对于个体工作,在民营企业工作的男性未能显著快速进入婚姻,这一方面可能和民营企业的工作环境有关^①,使得民营企业男性的优势被中和,另一方面也可能说明在择偶方面,个体在民营企业工作本身并不具有优势。

^①李钟瑾,陈瀛,齐昊等:《生存工资、超时劳动与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政治经济学评论》,2012 年第 3 期。

模型6和模型7为女性样本条件下工作和教育对初婚风险的影响。相对于全模型和男性样本结果,女性结果有所不同。不同受教育程度没有表现出明显差异,说明教育对于女性结婚而言,并没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这可能是由于受教育程度对于女性进入婚姻具有双重作用:一方面可能会因为高受教育程度带来的较好经济前景而增强了其自身的独立性,降低了婚姻对女性的吸引力^①;另一方面,较高受教育程度女性的经济前景愈加被配偶所看重^②,因为能够分担经济压力,促进女性进入婚姻,从而导致不存在显著差异。女性在体制内工作的初婚风险与个体工作没有显著差异,但在民营企业工作会显著降低初婚风险,即会减缓女性进入婚姻。这可能是因为进入民营企业工作的女性,面临更加激烈的职场竞争以及更长的劳动时间^③,家庭—工作矛盾更加明显^④,所以对其进入婚姻有显著抑制作用。不同于男性的是,女性党员身份会显著降低初婚风险,即女性党员结婚更慢。相对于西部地区来说,东北地区和东部地区的女性结婚更晚^⑤。具体见表4。

表4 分性别初婚风险的离散事件史分析

	男性		女性	
	模型4	模型5	模型6	模型7
受教育程度(初中及以下为参照组)				
高中	1.396*** (0.069)		1.032 (0.060)	
大专及以上	1.369*** (0.086)		1.016 (0.067)	
工作类型(个体为参照组)				
体制		1.399*** (0.073)		0.955 (0.055)
民营		1.084 (0.057)		0.846*** (0.048)
党员(是=1)	1.116 (0.088)	1.086 (0.086)	0.784** (0.096)	0.783** (0.093)
父母受教育程度(小学及以下为参照组)				
初中	0.902** (0.046)	0.948 (0.049)	1.049 (0.055)	1.116** (0.060)
高中及以上	0.906 (0.058)	0.975 (0.060)	0.974 (0.062)	1.04 (0.064)
工作经历		0.964*** (0.011)		0.994 (0.014)

①LAVY V., ZABLOTSKY A., Women's Schooling and Fertility under Low Female Labor Force Participation: Evidence from Mobility Restrictions in Israel,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Vol.124, 2015, pp.105-121.

②SOUTH S. J., Sociodemographic Differentials in Mate Selection Preferences,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the Family*, Vol. 53, No. 4, 1991, pp.928-940.

③李月,成前,闫晓:《女性劳动参与降低了生育意愿吗?——基于子女照护需要视角的研究》,《人口与社会》,2020年第36期。

④吴愈晓,王鹏,黄超:《家庭庇护、体制庇护与工作家庭冲突——中国城镇女性的就业状态与主观幸福感》,《社会学研究》,2015年第6期。

⑤交互项结果与主效应基本一致,本文由于篇幅所限故未报告。

续表

	男性		女性	
	模型 4	模型 5	模型 6	模型 7
地区(西部为参照组)				
东北	0.922 (0.078)	0.889 (0.075)	0.744*** (0.061)	0.746*** (0.062)
中部	1.015 (0.051)	1.018 (0.051)	1.041 (0.057)	1.061 (0.058)
东部	0.984 (0.042)	1.008 (0.044)	0.847*** (0.038)	0.887** (0.042)
风险期对数	1.03 (0.021)	1.021 (0.020)	0.895*** (0.020)	0.890*** (0.020)
常数项	0.129*** (0.006)	0.135*** (0.006)	0.270*** (0.012)	0.279*** (0.013)
样本量	28193	28193	19059	19059

注:括号内为标准误;* p<0.1,** p<0.05,*** p<0.01。

3.分初婚队列考察工作类型和受教育程度对初婚风险的影响。如表5所示,模型8到模型11呈现了不同初婚队列受教育程度对初婚风险的影响。总体上,相对于初中及以下,更高的受教育水平会显著提高初婚风险,即受教育水平高,会更早进入婚姻。但在1978年之前的初婚队列中,相对于初中学历者,高中学历者比大专学历者更能提高初婚风险,高中学历者进入婚姻的概率是初中及以下学历者的2.6倍,而大专及以上学历与初中学历者不存在显著差异,这一方面可能是因为这一时期大专及以上学历者样本量较少,方差较大,估计结果不稳定,另一方面可能是因为在计划经济体制下高等教育更易受到婚姻匹配和可能政治风险的影响。相对于大专及以上学历,高中学历者相对而言已经能够获得较好的经济回报,从而促进婚姻。1978—1998年初婚队列,经历改革开放,恢复高考,大专及以上学历者显著提高了进入婚姻的概率,但同时经济政策的调整,高中和大专及以上学历对于初婚风险的影响作用相对下降,变为初中学历者初婚风险的1.5倍。1999年之后的初婚队列,经历市场化改革进一步深化,学历的差异尽管显著但有所收缩,也就是不同学历都可以在市场经济中有所成就。到2008年之后的初婚队列,高中和大专及以上学历者同初中及以下学历者的差异再次扩大,大专及以上学历者是初中及以下学历者初婚风险的2.1倍,高中学历者是初中及以下学历者初婚风险的1.6倍。假设3a得到验证。党员在1998—2008年初婚队列中显著,是非党员进入婚姻风险的1.3倍。这可能是因为这个时期,部分党员拥有更好的技术能力^①,或携带资源从体制内进入市场^②,更容易获得成功,因此更快进入婚姻。女性相对男性更早进入婚姻的风险不断提升,且父母受教育水平对于初婚风险的影响越来越大,相对于小学及以下学历,父母有初中和高中及以上学历的影响在不断增大,而且更为显著。工作经历随着初婚队列晚近不再显著,这可能是因为市场环境的不稳定性提升,人们更加习惯工作的变换。叠加婚姻本来的推迟趋势,工作变动对初婚时间快慢的影响越来越小。在地区差异上,其他地区总体而言都是随着初婚队列不断晚近,相对西部地区降低了个体进入初婚的风险,也就是比西部地区结婚更慢,但其中东北地区先经历了在1978年前初婚队列中能显著提高初婚风险到1978—

①NEE V., Social Inequalities in Reforming State Socialism: Between Redistribution and Markets in China,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Vol.56, No.3, 1991, pp.267-282.

②RONA-TAS A., The First Shall Be Last? Entrepreneurship and Communist Cadres in the Transition from Socialism,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Vol.100, No.1, 1994, pp.40-69.

1998年初婚队列与西部不存在显著差异,到1999—2008年初婚队列能显著提升初婚风险,再到2008年之后的初婚队列显著降低初婚风险的过程。中部地区除1999—2008年初婚队列所在的快速市场化阶段相对西部地区显著降低初婚风险外,在其他初婚队列中均不显著。东部地区相对西部地区在改革开放之前的初婚队列上没有差异,在改革开放之后的初婚队列中显著降低初婚风险,且程度越来越大且更加显著。这表现出了市场化改革在不同地区的影响差异。

表5 分时期不同受教育水平、工作类型初婚风险的离散事件史分析

	模型 8	模型 9	模型 10	模型 11	模型 12	模型 13	模型 14	模型 15
	1978 前	1979—1998	1999—2008	2009 后	1978 前	1979—1998	1999—2008	2009 后
受教育程度(初中及以下为参照组)								
高中	2.629*** (0.736)	1.449*** (0.073)	1.311*** (0.123)	1.563*** (0.136)				
大专及以上	1.092 (0.715)	1.478*** (0.119)	1.454*** (0.140)	2.060*** (0.179)				
工作类型(个体为参照组)								
体制					2.147*** (0.458)	1.212*** (0.059)	1.197* (0.123)	2.178*** (0.250)
民营					1.699 (0.564)	1.364*** (0.087)	1.511*** (0.138)	2.224*** (0.223)
党员(是=1)	0.76 (0.240)	0.982 (0.103)	1.301* (0.195)	0.848 (0.098)	0.721 (0.231)	1.094 (0.113)	1.458** (0.217)	1.026 (0.119)
性别(女=1)	1.238** (0.114)	1.401*** (0.050)	1.628*** (0.109)	1.723*** (0.109)	1.217** (0.111)	1.364*** (0.049)	1.580*** (0.106)	1.640*** (0.105)
父母受教育程度(小学及以下为参照组)								
初中	1.512 (0.456)	1.072 (0.061)	1.301*** (0.104)	1.560*** (0.121)	1.385 (0.423)	1.076 (0.061)	1.357*** (0.108)	1.501*** (0.116)
高中及以上	0.893 (0.247)	1.102 (0.081)	1.089 (0.105)	1.325*** (0.117)	0.848 (0.240)	1.208*** (0.087)	1.234** (0.115)	1.447*** (0.122)
工作经历					0.957 (0.046)	0.977* (0.013)	0.921*** (0.019)	0.995 (0.016)
地区(西部为参照组)								
东北	1.390* (0.274)	1.072 (0.082)	2.000*** (0.326)	0.310*** (0.055)	1.353 (0.268)	1.061 (0.081)	2.088*** (0.344)	0.336*** (0.060)
中部	1.17 (0.137)	1.019 (0.050)	0.845* (0.081)	0.955 (0.086)	1.187 (0.139)	1.012 (0.050)	0.868 (0.084)	0.937 (0.084)
东部	1.045 (0.113)	0.906** (0.038)	0.813** (0.066)	0.806*** (0.060)	1.039 (0.113)	0.892*** (0.039)	0.843** (0.070)	0.792*** (0.059)
风险期对数	1.038 (0.060)	1.174*** (0.026)	1.306*** (0.054)	0.904*** (0.031)	1.045 (0.061)	1.163*** (0.026)	1.323*** (0.055)	0.909*** (0.032)

续表

	模型 8	模型 9	模型 10	模型 11	模型 12	模型 13	模型 14	模型 15
	1978 前	1979—1998	1999—2008	2009 后	1978 前	1979—1998	1999—2008	2009 后
常数项	0.171*** (0.030)	0.102*** (0.007)	0.0641*** (0.009)	0.0315*** (0.004)	0.173*** (0.030)	0.110*** (0.008)	0.0639*** (0.009)	0.0252*** (0.004)
样本量	3022	22410	6757	15063	3022	22410	6757	15063

注:括号内为标准误;* p<0.1,** p<0.05,*** p<0.01。

图 1 更加直观地呈现了在不同初婚队列中不同受教育程度对初婚风险影响的变动趋势。从时间趋势和风险期来看,随着时间的推移,从立业到成家的时间间隔不断拉长,进入婚姻的初始生存概率越来越高,曲线更加平缓,进入初婚的概率随着时间间隔的增加上升^①越来越慢,说明人们进入婚姻的时间越来越晚,进入婚姻的速度也在整体性变慢。从不同受教育水平的三条线来看,高中和大专及以上学历者在 1978 年前后相对位置发生了反转,1978 年之前的初婚队列,高中学历的生存曲线下降更快,初中及以下和大专及以上学历者依次下降。1978 年之后的初婚队列大专及以上学历者曲线下降更快,高中和初中及以下学历者依次下降。而且三者的区别总体上是不断扩大的,这也表明中国社会不同受教育程度的回报在不断分化,对于初婚的影响作用大小也在发生变化。个体受教育水平越高,进入婚姻的风险就越大,越快进入初婚。2008 年之后曲线的变动波动较大,这主要是受到数据影响,预测值较为不稳定,所以造成了曲线波动较大,但教育程度之间的分化趋势依然明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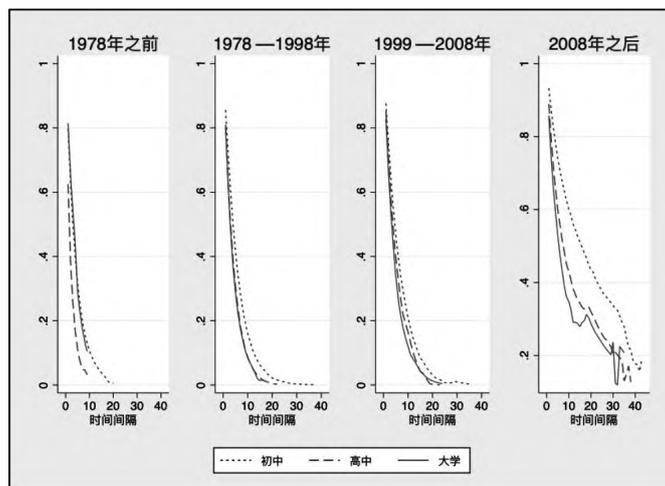


图 1 分初婚队列受教育程度对初婚风险的影响

模型 12 到模型 15 呈现的是不同初婚队列上不同工作类型对初婚风险的影响。相对于个体工作者,体制内工作者的初婚风险经历了一个 U 型变动。具体而言,在 1978 年之前的初婚队列中,体制内工作者的初婚风险是个体工作者的 2.1 倍;在 1978—1998 年的初婚队列中,体制内工作的影响减弱到 1.2 倍,但依然显著;在 1999—2008 年初婚队列中,体制内工作者相比于个体工作者的初婚风险差异显著降到 10% 置信区间的 1.2 倍;2009 年及之后初婚队列,体制内工作者的初婚风险上升到个体初婚风险的 2.2 倍。与体制内工作变动趋势不同,民营单位工作者相对于个体工作者的初婚风险变动呈现对勾型。在 1978 年之前的初婚队列中,民营工作者的初婚风险是个体工作者初婚风险的 1.7 倍,但不存

^①此处为生存曲线,所以曲线下表示不进入婚姻的概率越来越低。

在不显著性差异。1978年之后初婚队列中,民营企业工作者的初婚风险先下降到1978—1998年初婚队列的1.4倍,但与个体工作者存在显著差异,然后保持稳定提升,到2009年之后的初婚队列,民营企业工作者的初婚风险是个体工作者的2.2倍。假设3b得到验证。这一变动符合对应阶段的特征。在改革开放之前,我国实行计划经济体制,物资实行配额制,体制内工作意味着在物资供给和住房安排等方面具有明显优势,具有完善的福利体制和较好的社会地位,因此进入婚姻更快。改革开放之后,开始突破计划经济体制,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个体工作的收入开始上升,体制工作的优势有所下降。20世纪90年代推进市场化改革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特别是1998年深化国企改革,打破了人们对于体制工作是铁饭碗的想象,同时我国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使得体制内工作相对于民营工作的吸引力下降。2008年的经济危机使人们切身经历了市场的不稳定,体制内工作成为稳定的代名词,加之体制具有的社会声望,使得体制内工作再次成为婚姻匹配的优势条件。民营工作在1978年之前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受到政策管制,并且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并不被人们广泛接受,所以相对个体工作而言没有显著差异。伴随着改革开放,开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民营企业作为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开始不断发挥作用,但由于同时期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所以相对优势比1978年之前还有所下降,但仍然存在显著差异,能够显著促进人们进入婚姻。进入20世纪90年代特别是1998年之后,经济的快速增长和消费主义的兴起,促使人们对经济资源的考虑更多,民营企业在市场化改革中快速发展,收入显著增加,为进入婚姻创造了良好的物质条件。而且这种相对趋势并没有受到经济危机的影响,民营企业工作相对个体工作而言依然具有促进婚姻的优势。党员身份、性别、父母受教育程度和地区差异对于初婚风险的影响与前述基本一致。具体见表5。

图2直观呈现了不同初婚队列中工作类型对于初婚风险的影响。总体上,不同工作类型曲线的变动与不同受教育程度曲线变动一致,即随着时间的推进,曲线的形态从更加直立变为更加倾斜,随着时间间隔的增加,生存概率下降越来越慢,这说明人们的初婚年龄在不断推迟,进入初婚的速度也在总体性减慢。不同工作类型之间,在1978年之前的初婚队列中,相对于个体工作者,体制内工作者曲线下降最快,民营企业工作者次之。1978年之后的初婚队列中,民营企业工作者曲线下降最快,体制内工作者曲线下降次之。1998年之后的初婚队列中,体制内工作者曲线距离个体工作者曲线更近。2008年之后,个体工作者的生存曲线下降更慢,民营工作者与体制内工作者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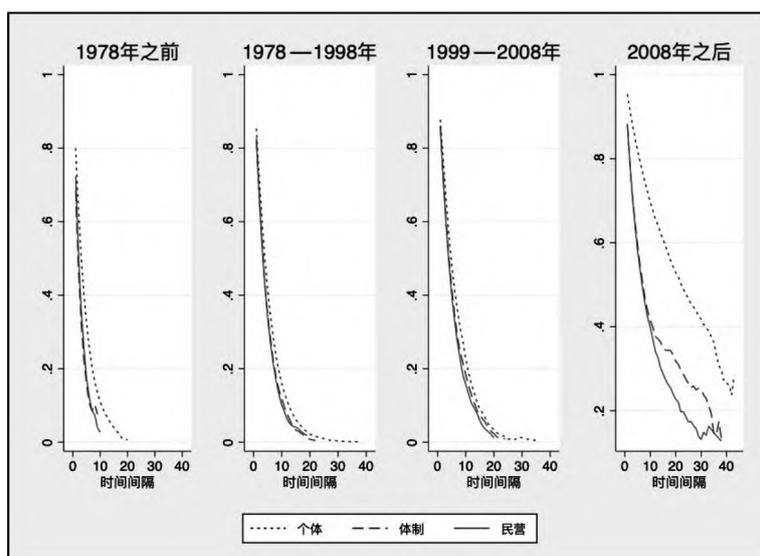


图2 分初婚队列工作类型对初婚风险的影响

线下降速度相对一致,民营与体制内工作者和个体工作者曲线距离越来越远。这反映了人们在不同时期结婚时所关注的因素存在差异,不同工作类型之间的差异不断分化。2008年之后初婚队列曲线的变动因为样本量问题导致预测值不稳定,所以不够平滑,但基本趋势比较清楚。

五、总结与讨论

初婚时间是研究婚姻模式的重要内容,深入研究初婚时间的变动趋势及其影响因素有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我国婚姻模式的变迁。研究初婚时间,首先要明确计算初婚时间的起点。已有研究大多以15岁生理性成熟作为初婚时间起点,这是成家立业模式下将成家作为生理性成熟和社会性成熟的核心标志。伴随着社会转型,人们的生命历程逐渐嵌入了教育和就业,成家立业开始转向立业成家,人们逐渐将教育和就业作为成家的前提,并以此为起点考虑婚姻问题。其次要明确影响因素的作用方式。社会经济地位是影响初婚时间的重要因素,大多数研究从社会经济地位和初婚的竞争性关系假设出发得出社会经济地位获得推迟初婚时间的早晚效应,但忽视了生命历程变迁下社会经济地位和初婚之间已经变为时序性关系,社会经济地位可以影响初婚时间的快慢。在上述背景下,本文基于CLDS 2018年数据,使用离散型事件史分析方法,将风险期起点从15岁生理性成熟变为获得初职时间,考察教育和工作类型对个体进入婚姻的影响。结果发现,教育和工作类型对于个体进入婚姻的早晚和快慢都产生影响。从人们进入婚姻早晚角度看,通过描述性分析发现,受教育水平越高,在体制内和民营企业工作的人们的初婚年龄越大,进入婚姻越晚,这反映了教育和工作类型的推迟效应。从影响人们进入婚姻快慢角度看,通过回归分析发现,受教育水平越高,人们进入初婚越快;相比于个体工作者,体制内工作者进入初婚越快。这种作用在性别之间存在明显不同,对于男性而言,受教育水平越高,在体制内和民营企业工作,进入初婚越快;对于女性而言,不同受教育水平之间差异不显著,女性在民营企业工作会显著减缓其进入初婚时间。不同初婚队列之间,教育和工作类型对于初婚风险的影响存在差异,总体呈现出先趋同再趋异的特征。

早晚效应与快慢效应,实际上是教育和工作对初婚时间影响的一体两面。从学理维度上讲,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Oppenheimer等一众学者便已经从理论和实证两个维度证实了社会经济特征,特别是教育和工作,对初婚时间的影响不仅包括早晚效应,也包括快慢效应,这我们的实际经验也是相符合的。但从我国的研究来看,绝大多数研究只论证了早晚效应,忽略了快慢效应。之所以如此,不仅是统计的局限使得事件史分析无法同时呈现两种效应^①,更多是如何全面理解教育和工作对初婚时间影响的问题。已有研究对推迟效应的关注大多是在Becker经济独立性假设下探索教育和工作如何发挥作用,但常常遇到的困境是对于男性而言,教育和工作依然是推迟效应。这是因为教育和其他效应大多被其占用时间而发生的推迟效应所取代。事实上,如果单从占用时间角度看,这个事件可以是教育和工作,也可以换作其他。当然,教育和工作客观占用时间从而推迟初婚时间也是一种作用,但教育和工作作为生命历程中的重要事件,到底如何发挥作用,需要进行更深入的社会学探索。从实践维度上讲,初婚作为人口再生产的起点,在当前我国少子老龄化的严峻人口态势下,需要给予更多关注。教育和工作不仅具有早晚效应,还具有快慢效应,这让我们有机会在提高人口素质、尊重个人选择的同时,去探讨如何促进结婚。然而正如已有研究提到的,

^①因为二者风险期的时间起点不同。

随着高等教育的普及、经济体制的变迁,教育和工作对于初婚时间变动的解释度可能会逐渐下降^①。因此,我们更应该考虑的是,在不立业难成家的社会转型背景下,我们到底该如何切中影响人们进入初婚的命脉,找到人们在进入婚姻时最关心的因素,从而对症下药。

本文仍存在一些问题会影响结论的稳健性。一是本文尝试通过控制教育完成早于初职时间来控制教育年限造成的初婚推迟效应,但这种方式是否能有效实现这一目标有待评估。二是即使能够有效控制教育完成带来的时间推迟,仍无法避免的是中国社会对于婚育完成的上限时间——35岁,这一隐形的社会规范的约束。这种影响可能体现为尽管笔者已经将风险期的起点改为具有相对性的初职时间,但人们仍然面临着共同的35岁的时间压力,这对于受教育水平高或者参加工作比较晚的人而言,仍具有时间效应,而且这种效应与教育和工作所起到的加速效应方向相同,即使平均初婚年龄远小于35岁,但在解释上仍存在混淆的可能。三是需要再次强调,本文聚焦的群体具有严格的限定,这种限定尽管是当前社会的变动趋势,但仍在结论推广上具有限制。

From Establishing a Career to Starting a Family: The Impact of Education and Work on the Timing of First Marriage during Social Transformation

CAO Gui-xiang, LI Jian-xin

(Department of Sociology,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1, China)

Abstract: The shift from “family before career” to “career before family” is a significant trend in the transitional process of Chinese youth into adulthood, urging us to re-examine the trend of first marriage timing and its influencing factors. Most existing studies on how education and work affect the timing of first marriage focus on the delayed effect, which obscures the effect of its pace on the timing of first marriage. This paper, based on data from the China Labor-force Dynamics Survey (CLDS) in 2018, employs a discrete-time event history analysis method, changing the risk period from the physiological maturity at the age of 15 to the time of obtaining the first job, to examine the impact of education and type of work on the pace of first marriage timing. The results show that education and type of work can affect the pace of individuals’ first marriage timing. Overall, people with higher levels of education tend to enter their first marriage faster; compared to those who work in private enterprises, individuals with jobs in government institutions or public sectors tend to enter their first marriage faster. This effect varies significantly across different genders and first marriage cohorts, providing insights for us to understand the current marriage issues among young people.

Key words: social transformation; career before family; pace of first marriage; education and type of work

(责任编辑 赵莉萍)

^①贺光烨,张瑶,吴晓刚:《教育程度越高,结婚就越晚吗?婚姻市场上本地户口的调节作用》,《社会》,2021年第2期。

学者简介

李建新



北京大学人口研究所法学博士，日本东京都立大学博士后，美国密西根大学访问学者，现为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大学中国社会与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北京大学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基地研究员。主要研究领域为人口学、人口社会学、民族人口、老龄健康、社会统计方法等。出版《中国人口结构问题》《中国人口之殇》《误读的中国人口》等著作，并在《社会学研究》《人口研究》《中国人口科学》《人口学刊》《人口与经济》等中文核心期刊发表学术论文70余篇。

孙旭友

河海大学社会学博士，山东女子学院教授，长期从事环境社会学、基层社区治理与健康养老问题方面的教学与研究。现任山东女子学院社会与法学院副院长、青岛理工大学与济南大学社会工作兼职硕士研究生导师，兼任山东省社会学会理事、中国社会学会环境社会学专业委员会理事、山东省社会工作专家库专家成员等。主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青年基金项目等多项课题，在《江西社会科学》《学海》《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等CSSCI学术刊物上发表高水平论文十余篇。

